

远 古 卷

(从传说时代到商代)

第一章 远古历史的理解问题

一 从顾颉刚的“层累说”说起

人类历史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晰，犹如中国的山水画，近处树木婆娑，山石毕露，远处则是轻描淡写，水天一色。

历史由模糊到清晰，取决于人类的记忆手段。文字发明之前，人类保存历史的方法是口耳相传。十口为“古”的说法，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类是怎样保存历史记忆的。有了文字之后，由于书写材料的缺乏，人们所记载的历史仍是极其的简单。只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之后，历史才被大量地保存下来。

历史记载的繁简，很难说孰优孰劣。今日人类，事无巨细都有记载。报章杂志，文件档案，录音摄像，凡此等等，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实地记录下来。但是，这份遗产对于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恒河沙粒般的史料，反倒显得历史无从把握，其研究工作亦显得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却轻松得多。有限的史料，虽然很难再现当时历史的全景，但却能粗线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主脉，且可使后人对于古人的历史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认同，而不致于因史料的庞杂而众说纷纭，难衷一是。

但是史料的匮乏，同样给后人的历史认识带来了困难，而且

使历史的附会成为可能。人是需要历史的。此种需要既是功利性的，又是生存意义上的就前者而言，人类的行为，总是需要历史为其根据，或为其辩护；就后者而言，人类需要从历史中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定点。人生在世，即生活在限定的时空之中。对于空间，他很难为自己安立坐标。周遭的一切，他既感到陌生，亦感到无所适从，大自然的威力迫使他只能俯首听命。而对于时间，他却有着另一种感受。在这一世界里，人是主宰。时间的世界即人化的世界，历史的世界。而历史是人的历史，时间的绵延也就是人的活动的线性积聚从历史中，人类可得知自己从何处而来，现今又处于何种位置，而且这现今的位置乃又是由历史的线性积聚所决定的。或者说，历史将他们安置在某一个点上，而不是游荡无根。这根，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和心灵所可依托的历史。因之，人类对历史的眷恋实则对根的眷恋；他们乐于记载或传诵历史，实质上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一份关心。

然而，人类对历史的意识，本身又是历史性的，是人类智能进化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何时人类有了时间观念，有了对历史的自觉。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的历史意识是随着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加强的。文明社会之初，人类已经有了历史意识，并通过口头传诵而保存历史的记忆。但此时，他们所认识的历史只是局限于部落，很大程度上只是部落迁徙、首领的代代相传以及各部落之间的战争，至于更大范围更多内容的历史，则是他们不可能认识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予以传诵。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版图的扩大，历史内涵的日渐丰富，他们开始有了对历史的思考，而非仅仅对历史的传诵。对历史的思考，主要的是对文明的思考，具体说是对文明事实的一种根源性的说明。比如，他们有了房屋、宫室，便试图构想一位最早的建筑师；他们靠农业而生活，知道百草可以治病，便试图构想出农业

和医药的发明者；他们认识到了人的可贵，认识到了人同外界万物关系的密切，便试图探寻人类的起源乃至世界万物的起源问题。

这样一种关系，决定远古历史真假难辨。一方面，通过口耳相传，先民确实保存了一定的历史记忆；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先民所传诵的历史，有许多又纯系虚构，是他们出于对历史的理解而附会于历史的。关于后者，顾颉刚的“层累说”最有见地。

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对远古历史的怀疑论者代不乏人，但最有成绩的则是本世纪上半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1923年，顾在同钱玄同讨论《诗经》的辨伪问题的一封信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层累说”，即“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大意有三：（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愈是高大；（三）即便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否属实尚无把握，但亦可知道它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譬如，世人说史，大多从盘古说起，即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而顾颉刚则认为，盘古也好，三皇五帝也好，都是虚构的人物，而且越是往后世，虚构的历史越早。在西周，人们只知道有个大禹；到春秋时期，才有尧舜的传说；黄帝、神农是战国时期的杜撰；“三皇”之说直到秦代才有；而盘古的传说更晚，是汉以后才出现的。

顾颉刚的“层累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且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故得到了当时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的广泛赞誉。但是顾氏的“层累说”虽有严谨的实证依据，但由于缺乏思想性的学理思考，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固是事实，但这并非说明相关的古史并不可信。如果一概予以否定，古史岂不等于一片空白？

第二，古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虽有虚构的成分，但却不

是凭空捏造，而是有它的历史原型。特别是，古人将神话历史化，说明在神话与历史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果不指出此种联系，就很难把握神话历史化的实质所在。

第三，古人“层累”地造成古史，有着极其深在的内因，同人的历史意识的自觉和发展紧密相关，是人类心智进化的结果，且关系到人的生存意义的寻问。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而仅仅只看到古人作“伪”的一面，那么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古人的有关历史记忆都是胡编乱造。实际上，古人相对于今人，秦以前相对于秦以后，所记述的历史要真实得多。秦以后，尤其是现代人，虽然口头上喊着历史学必以真实为原则，但落到具体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则往往很难做到真实和客观。王朝政治、集团利益、个人的毁誉以及历史学家对权力的依附，无不导致历史学的异化和不实。而秦以前，虽然同样难免历史学的失真，但由于史学同权力尚保持一定的距离，故相对来说更具有真实性，只不过其真实性以传说甚或神话的面目而出现。

因之，对于远古的中国历史，“信古”和“疑古”两种倾向均不可取。理想的作法应是：信其传说之中的历史内核，疑其表述方式的传说外表。这其中，即需信又需疑。信而不疑，则易将传说当信史；疑而不信，则易于蹈入虚无主义。而二者相比较，疑比信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疑，才会有批判，有学理上的深入思考。只是在疑的过程中，切忌为疑而疑，重要的是怀疑和批判之后对古史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叫作“释古”。

二 再从《山海经》说起

中国古籍，神秘诡奥之最者，莫过于《山海经》一书，明代

学者胡应麟将其称为“古之语怪之祖”。

《山海经》的内容，汉代刘歆概括为：“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至于该书的类别，从刘歆起，历代学者说法各异。刘歆和历代许多史家视其为地理类书籍；《汉书》和《宋史》看作术数类；明代的胡应麟认为是专讲神怪之书；清代纪昀称其为中国“小说之最古者”；19世纪的张之洞将其看作历史书；20世纪的鲁迅则说是“古之巫书”，袁珂认为是“神话之渊府”。

如此种种说法，除纪昀“小说之最古者”外，均有一些道理，或者说都有部分的正确。《山海经》以“山”和“海”为题，所记述的也主要是各地山川地理，风情习俗，将其看作地理书，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书所记，除地理外，最令后人不解的是它对各地神怪的描述，充满着离奇古怪的神秘色彩，视之为神话、巫术之类的书，亦无大错。而且是书论列到许多传说中的人物，如黄帝、大禹等，目之为史书，也是说得过去的。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既然依其内容可以看作不同类别的书，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山海经》是不能归到上述说法中的任何一类的。也正因为对是书的性质不甚明了，故学者们对其解释和研究也就难免南辕北辙，至多也只是盲人摸象，得出一些局部印象。

实际上，《山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只不过，其内容不是人类学的理论，而是人类学的经验材料。反过来说，也只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才可能解读这部“天书”的玄奥。据钟敬文先生自己说，他曾在1930年前后，试图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解释《山海经》，还写过《山海经》之文化史的考察的书稿。可惜该书没有写完，更未能刊印。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由西方人所创立的学科，是西方列强海外殖民和掠夺的附产品，形成于 19 世纪的下半叶，主要研究原始民族的宗教、习俗、艺术、社会结构等等，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和具有经典性的权威著作，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等。

这些经典性的著作，近十几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再度兴起，几乎都已有中译本的刊行，亦有少数学者试着用其理论解释中国远古的文化现象。但由于引进的时间较晚，加之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效果并不明显，学者们研究古史，所借助的仍是文献和考古材料，很难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之光照射古史研究这一幽暗的殿堂。

古史研究，特别像《山海经》这样的文献，仅仅依靠传统的考据方法是很难收到实效的。而考古材料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予以说明，也只能是一堆死物。原因是：一，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话语体系，且同当时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一旦社会生活发生变易，话语失去它的历史背景，其意义也就变得模糊起来，从而导致后人理解的困难。二，对待古代文献，后人总是难免根据自己的需要予以理解和阐释，从而使之误读。三，考古材料虽然能够真实地反映古代人的历史，但因其零散，同样具有不确定性，更难体现当时历史的全貌。考古材料自身不会说话，说话的是它的研究者。而研究者因其知识局限、思想倾向、集团利益、历史观念，都有可能作出错误的解释。而人类学引入古史领域，则可弥补上述之不足。人类学建立在现存的原始民族之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依据的是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而且这些经验事实又是全方位的，既在物质生活空间，又在精神生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能

将古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通贯起来予以理解。易言之，只有用人类学理论之光的照射，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才能够得以复活，才能够体现当时的历史境况，并从而使后人的理解成为可能。

《山海经》之所以被视为一部“天书”，为“语怪之祖”，就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历史，早已在汉民族消失，其语汇因其历史的背景的失去而失去了它的意义。用现代的话说，叫作语义因其语境的失去而失去。书中所记“人鱼”、“天马”、“鼓兽”、“举父”、“长右”，特别是“羽民国”、“灌头国”、“厌火国”、“交胫国”、“三首国”云云，如果不明了古人的精神世界，而只是顾名思义，那是永远也不得其解的。

实际上，一部《山海经》，就是该书的作者当时心目中的世界史。言其为人类学著作，是因为它的“史”同后世的所谓“史”含义大为不同。后人的“史”主要是王朝政治史，而先民的“史”则是人类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乃至他们的神灵崇拜，偏重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而这些也就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由此亦可推断，《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一定是很早的，或者说经过了漫长的形成期，而决不是像后世学者所说的，成书于战国或汉代。

《山海经》所记，有山有水，有各部落具体的地理位置。如《北山经》载：“《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多机木，其上多华草。逢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洧水，其中多芘石文石。”又言：“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无草木。”很显然，这样的文字，所记载的是地理，而且其位置很难说就是虚构的。只是“单狐之山”，“求如之山”的含义不为后人知晓而已。但是《山海经》所记山川，又并非只是为了地理之学，而是借助地理介绍各地的文化和习俗，尤其是介绍各地的原

始宗教和原始习俗。虽然其文字经过一定程度的神秘化，但是借助于人类学理论，同样是可以解读的。如《海外南经》载：“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又说：“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如果按照常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怪诞的，其人犹如天外来客。多少注释家由于不明其中奥妙，枉作章句之学，到头来还是坠入云雾，无法破译神秘文字所蕴含的历史真相。然而，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则是很好理解的。所谓“结匈国”，就是纹胸的部落；所谓“羽民国”，就是以羽毛装饰身体的部落。此外，像“修股国”、“奇股国”、“一臂国”、“三身国”、“反舌国”、“黑齿国”等等，都是部落的名称，且同先民的宗教观念、图腾崇拜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习俗紧密相关。此种情况，只要我们读一读西方学者关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类学材料，就会觉得很好理解啦。

当然，亦需指出的是，《山海经》并非成书于一时，更非某一位作者的独创，而是长时期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其中有些内容，掺杂了后人的附会。如对于黄帝、大禹、周穆王的记载，就很难说不是虚构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附会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全书的文化人类学之属性的。

三 精神的考古

人类历史的演进实际文化的传承关系，一切文化的刷新和新生活的开创，都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和历史的动物。

但是，前人对后人的影响，或者说后人对前人的依赖，表现则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成系统的。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研究模式，人们思考历史问题，只在“经济”二字上作文章，似

乎一部人类史就只有经济之一项，或者说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由经济决定的，好像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都只能是孔夫子所批评的“喻于利”的小人。殊不知，人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在历史创作行为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关系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强调其中一端而忽视另一端的作法，都是欠妥的。比如，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模式就不能解答下述关于它自身的两个问题：一，经济决定论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是此种观念形态直接改写了近百年来世界历史，直接决定了社会存在。二，此种观念形态出自于某一位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如果否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无法说明近百年的世界历史，而且也无法说明这位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更无法说明坚持其思想的必要性。既然一切以社会存在为转移，那么任何思想家都是可有可无的，更无须将其思想奉为教条。也就是说，经济决定论者之所以抱定经济决定论，并将其创始人尊为神圣，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观念的力量，等于否定了他们所坚持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

人作为感性生物是患得患失的。但是人的需要并非仅仅出于感性的欲求，并非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由肠胃决定的。人类活动是有目的性的，而目的的设置则有多层的考虑。如果仅仅是为了肠胃，为了物质利益，则人即与动物无异。人兽之区别，就在于人在为了满足生理的需求之外，还有着更高和更深一层的需求，即寻求生命之意义。他既需形而下者的“器”，更需寻求形而上者的“道”。而且即使是形而下的层面，他亦需从形而上的层面予以理解，从而将其纳入终极考虑之中。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由他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具体说就是：人是有限的，这一基本事实又决定着他必须追求无限，或者说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架设桥梁，他的一切历史活动和文化创造都可视为出于这一目的。而这

一切都不是物质世界的事，而只能在观念的世界里并通过观念的力量而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之于人类历史的经验事实，此种道理更为明显。一个文明民族的发展之路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它的观念形态决定的。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文明同西方文明作一大致的比较时，更可发现，两种文化之差异实则就是两种观念形态之差异。中国人重实践理性，天人无隔，内外无碍，宗教观念淡薄，王权崇拜意识强烈；西方人重科学理性，天人相分主客对峙，宗教观念浓厚，但王权意识则相对淡薄。这样两种观念形态直接决定了各自的文明路向。近代中西两方的冲突，表面看来是器物层面上的事情，但实质则是两种观念形态的冲突。中国的被动挨打受尽屈辱，亦非出于船不坚炮不利，而是其观念形态挡不住西方思潮的冲击，确切说不合近代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

而且，如果将人类历史作一纵向考察，还可发现这样带规律性的现象，历史越是古老，观念的力量越是巨大。特别在文明之初，观念形态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人类由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手段发展的结果，但如何生活于新的社会形态之中，人们首先得考虑社会的和谐和人生意义的安顿问题，即必须建立一套新的观念形态以应付新的生存状况。这表面看来好像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对于二者之关系，人们考虑的重点则在后者；二，先民所关心的主要是两种生产，即人的繁衍和生活资料的获取，而这两种生产虽然都是形而下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被神秘化的，属于观念形态里面的东西。三，由于原始思维的影响，先民思考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无不打上神灵崇拜的印记，无不纳入当时的观念形态之中。四，观念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直接影响

后人的历史创造行为。

而这一点，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中，同样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比如，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奉行天人合一的思想，源头就在于文明初期的观念形态。又比如，中国人看重家族，宗统与君统合一，根源就在于先民的祖先崇拜观念。西方历史亦为如此。比如西方人重科学理性，原因就在于他们神人分立的神话传统。又比如，他们从古希腊起就有民主政治的传统，而民主政治同样导源于他们的神话传统。

因之，对古史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国家的兴衰、王朝的变革，物质手段的更新，而是当时的观念形态，特别是先民的精神生活。这里的理由是：第一，在先民那里，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第二，前人的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亦主要体现在精神领域。所谓传统，也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传统。对今日中国来说，四大发明已无实质性的功能意义，但古代中国的观念形态却时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但是，千百年来，人们记述历史或研究历史，重点并不在精神领域，而是大多侧重于王朝政治、宫廷党争，或者物质手段方面的进步。此种情况在远古的历史研究领域，更为明显。例如对夏商周三代的研究，人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对于先民的精神生活、信仰体系及其同后世中国历史之关系，则很少有人涉及。

对先民的精神史的研究，可称为“精神的考古”。精神的考古不同于考古学家所作的工作，而且难度也大得多。考古学家发掘一座遗址，便可大致模拟出一座城池或一个村落；发掘一个墓葬，很可能知道墓主的身份，还可通过陪葬的物品得知当时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精神的考古，虽然也可以通过上述的田野工作而获取信息，但实物材料毕竟不能复现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

任何考古材料都是死物，都不能直接说话，而必然经过某种研究思想的观照，才可能体现出它的历史内涵。文献材料的功能，亦大体如此。但是此种研究思想又如何获致呢？既然考古材料和文献需要思想之光的照射，那么就说明这两种材料之本身是很难给予研究者以完整的或体系化的思想的。这是历史研究的悖论，对远古的历史之研究尤为如此。对远古历史之研究，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都是零散的，片面的，不成系统的，不足以给当时的历史以完整的说明。前些年，我国史学界有“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三种说法。如果细究起来，恐怕这三种说法都是有问题的。理论虽然得自于经验事实，但任何经验事实都是不完整的，不足以同理论等量齐观。理论具有超经验的性格。数学定理最能说明这一点。虽然人文世界历史世界同自然世界有别，但理论同经验之关系，道理则是同一的。更何况，历史研究的经验事实也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说就是，任何试图给历史建构一种解释体系的人，其理论均非完全建基于历史事实之上。如其不然，历史上就不会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历史理论。历史的经验事实一成过去，就是恒定的，理论的多样性只能说明理论同历史的经验事实是有距离的，“论”并非一定来自于“史”。

英国的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前人的思想是可以重现的，方法就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他的研究对象的思想。譬如研究凯撒，历史学家必须把自己摆在凯撒的位置上，置身处地想想凯撒是如何思想的，为何会率军渡过卢比康河而进攻罗马。科林伍德的“重演”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第一，历史的时空距离决定着今日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回到凯撒的时代；第二，历史学家不具备凯撒的能力、品性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他是不可能重演凯撒之思想的。

思想重演的困难决定着精神考古的艰难。但问题又在于，欲

了解先民的历史，特别是要想弄清楚先民的历史同后世的联系，又必须从事精神的考古。

现代的文化人类学为精神的考古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材料。从上一个世纪的后半叶起，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一直以原始部落为重点。一大批西方的著名学者深入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之中，他们研究原始人的社会结构、婚姻形态、宗教类型、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等，为历史学家研究文明民族的远古时代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亦使精神考古成为可能。也可以说，现存的原始部落，本身就是原始文化的活标本活化石，只要深入考察其精神层面的文化，就可得知我们的祖先在文明之初乃至文明之前的精神风貌。

现存的原始部落之所以使精神考古成为可能，前提有二：一，这些原始部落大多与世隔绝，从未或很少受到文明的影响，从而使其文化带有地道的原始性。二，原始文化，不论是现存的原始部落的还是文明民族的原始阶段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即是说，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的文化形态，同现存的原始部落的文化面貌，大致上是一样的，从现存的原始文化里，亦可大致复原文明产生之初或之前文明民族的生活模式和精神文化。

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元的。就其纵向发展而言，情况大致是：文明社会的文化是多元的，即各民族因地域不同和传统文化不同，其文化亦各不相同。而原始社会的文化则是一元的，即世界各地的原始人因其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生存的问题，故而其文化大同小异。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原始人与文明人有着两种思维。文明人为逻辑思维，原始人为前逻辑思维。前逻辑思维阶段，原始人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观念是万物有灵论，即相信世界万物都同人类一样，是有灵魂的，并由此而

普遍奉行巫术。英国学者弗雷泽甚至将整个人类的精神史概括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

前逻辑思维是原始人的普遍特征，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特别在中国，此种状况尤为明显。也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的文明早期，有过从前逻辑思维到逻辑思维的飞跃，或曰革命性的转型，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飞跃。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巫术盛行，天人混沌，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前逻辑思维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进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科学理性的缺如，都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由此亦可见，精神的考古对于中国远古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这一工作，不排除对考古材料和文献的利用，但最主要的是借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之光。也只有这样，我们对先民的各种文化现象，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如果固守经济决定论，似乎一切都得从社会经济中去找原因，那么一部中国文明史是没法说明的，特别是对于先民的宗教观念以及相关的活动，就无法予以解释。而这些观念性的东西，才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四 神话中的史话

精神的考古，既需理论，亦需史料。就理论而言，西方学者已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资源，尤以文化人类学最为重要。而史料则不能外借，而只能从我们自己的陈迹中寻找。虽然其他民族的实证材料可以印证我们的研究成果，但却不能作为我们研究自己的历史的根据。

从我们自己的陈迹中寻找史料，不外乎三条途径，即地下发掘、文献考证和神话解释。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联系在一起

的，特别是神话同文献记载的关系最为密切。

历史是人的历史，但其最早的表现形式则是神话。正如科林伍德说：“神话是已知事实的一种陈述”。符号学的创始人卡西尔亦说：“在神话的想象中，总是暗含着一种相信的活动。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就会失去它的根基。”所谓“对象的实在性”，不能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真实。从本质上说，神话是虚构的。它的神祇以及神界的故事，均为想象的结果。但是言其虚构，只是现代学者的识见，是学术理性化之后的结论。在先民那里，他们是将神话当历史来叙述的。在他们看来，诸神就是他们的祖先。

先民对神话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究其根源，乃是因为神话发端于原始时代的宗教观念。那时候，先民为了应付自然的恶劣，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形态基础上，各氏族或部落都要设立各种神灵而予以崇拜。此种信念发展为图腾崇拜，再发展为部落的保护神崇拜。又由于神灵崇拜的变化紧联着人类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变化，神祇遂被谱系化、历史化和情节化，神话亦由此而产生。

神话是一种观念体系，是文明与野蛮之交的人类精神世界的集中表达，也是我们今日精神考古的重要材料。对其具体的神祇及其事功，可以视之为虚构，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成分，则不能作“虚构”看待。或者说，它的表现形式是虚构的，而内核则是历史的，真实的。如同后世的小说，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但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则是真实的。不同的只是，小说家写小说，知道自己在虚构，在以“假”说“真”，而先民创作神话，却想不到他们对神的诵唱是虚构的。在他们看来，诸神及其事功是真实的，而他们将其编成故事或诗歌予以传诵，也是出于求真的目的。或者说，他们根本想不到其中的真假问题。